

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 与阶层再生产^{*}

郑 辉 李路路

提要: 两个理论主导了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研究。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描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精英群体: 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则讨论了在转型中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干部精英内部的分化。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把握和解释当今中国的精英流动动态。本文作者建构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这个理论模型, 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 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渗透, 内部也不是内固的, 并已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 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 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作者的经验分析表明, 精英排他通过给予精英与非精英的子女截然不同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实现, 虽然更平等地成为党员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精英排他。精英代际转化则是因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再生产。

关键词: 国家社会主义 精英排他 精英代际转化 阶层再生产

自从德热拉斯(M. Djilas) 1957年的《新阶级》(德热拉斯, 1963/1957)一书问世以来, 很多学者关注国家社会主义中精英群体的选择机制和精英群体的形成过程。在这些文献中的研究主线是: 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群体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这种关系与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内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存在多大程度上的异同? 而于此又更直接、更深刻地聚焦到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关系上。其间较有代表性的是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前者讨论了在中国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的关系, 后者则讨论了在东欧后共

* 我们感谢边燕杰、麦宜生(Ethan Michelson)、吉尔·伊亚尔(Gil Eyal)、潘绥铭、郑路、胡松华, 还有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想法。文责由笔者自负。

产主义国家技术干部精英和行政干部精英之间的关系。然而,本研究认为,他们对中国市场转型下精英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且没有揭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的具体机制。因此,本文先厘清可资借鉴的这两个理论体系,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并用中国城市调研的经验数据,以及统计模型来证明这个理论框架。

一、理论背景

(一)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

魏昂德在 1995 年提出了精英分割理论。^① 他认为,在中国,相对于其他职业,一方面,大学学历是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最强的预测指标,而党员身份^② 对此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一方面,党员身份是进入行政管理职位最强的预测指标,大学学历对此也有显著的正作用。这两种主要资格所起到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大学学历使个人更有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而不是行政管理者;党员身份则使个人更有可能成为行政管理者,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魏昂德通过对职权、收入和住房的分析,认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不是“再分配精英”,知识分子始终没有走上阶级权力的道路(Walder, 1995)。由此,他认为,在中国,精英群体是分割的。

精英分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萨列尼的二元精英和二元途径模型的启发。萨列尼和康拉德(G. Konrad)在 1979 年曾断言匈牙利的知识分子“正处于走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他们指的是关于党的年老的精英——即德热拉斯于 1957 年所说的“新阶级”——将被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专业精英人士所取代的未来(参见 Walder, 1995)。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正走向阶级权力之路”:以前高学历而在政治上不可信的“专家”和政治上忠诚却缺乏教育的“红色人物”之间的区隔正在被消融(Szelenyi, 1982, 1983: 158—160; Walder et al.,

① 精英分割理论由魏昂德在 1995 年提出,在 2000 年他与李博柏(Li Bobai)和特雷曼(Donald J. Treiman)的合作文章中进一步确认和延伸。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简单地说是“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参见 Walder, 1995)。

② 党员身份在国外有关研究中被作为政治忠诚的一个指标。

2000)。在 1986 年和 1988 年的文章中,萨列尼对 1979 年、1982 年、1983 年的观点有所修正。他认为先前关于知识分子融入统治精英的推测是不成熟的(Szelenyi, 1986, 1988: 216—218)。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保持着政治上忠诚的官僚和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专业人士的分割,而且还存在两种不同的职业路径:一条路径通向具有权力和特权的行政管理职位,另一条通向拥有微小权力的专业技术职位;专业技术人员路径强调教育资格,行政管理者路径强调政治忠诚,但是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政治忠诚的考察程度和行政管理者高学历的考察程度就不是很清楚了(Walder et al., 2000)。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就是对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的解释。

魏昂德等学者在 2000 年使用纵贯的职业史资料和事件史模型,进一步发展其二元精英模型。他们发现:(1)高学历在两条职业路径中的影响作用都在增加;在现阶段,具有大学学历者成为干部精英的机率要高于高中毕业生,但是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2)党员身份在干部职业路径中的作用在下降,但它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且具有党员身份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从来也没有提高过。(3)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4)虽然 10 多年来,两条职业路径之间的差异也有所变化,但毛时代的路径模式仍然存在,它们之间的界限在所有时期都是清晰的。(5)中国的职业流动是一种同时与对政治机器的忠诚原则相结合而又与现代职业的能力原则相分离的混合物,这些年来变化是曾经被毛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复的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Walder et al., 2000)。^①

归纳精英分割理论主要论点是两个方面:(1)通向两种精英的路径是分离的:党员身份是通向高行政管理职位的先决条件,虽然教育程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高学历是通向专业技术精英的先决条件,党员身份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从来也没有提高过。(2)“再分配精英”是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如果从资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

^① 值得一提的是,魏昂德等人在 2000 年的文章中仍然在质疑后毛时期的职业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发展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从毛时期向更为一般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转变的结果,或在多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出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文章中明确地认为,这些职业模式的变化是曾经被毛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复的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

精英分割理论,精英分割强调的是在代内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分离,它们之间无法完成转化。魏昂德是想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谈“精英分割”问题;他想用“精英分割”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性问题。在他看来,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分割的、矛盾的、冲突的、截然不同的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两个精英群体,所以中国的政治秩序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魏昂德是从通向两种精英的路径的分野和再分配特权由干部精英垄断这两个方面来阐释精英分割的。对此,笔者试图提出的问题是:魏昂德提出的两个维度是否是认定精英分割的充分必要条件?或者说依着这两个维度是否就能够断言中国的精英是分割的呢?在笔者看来,从代内来看,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形成路径的确是不同的;但所谓精英是否是分割的,不能仅从代内流动或职业获得路径上简单视之,而应该从代际流动上考察,因为代际流动是比代内流动更能反映阶层之间关系的一个指标。当不同的精英群体在代际流动上互相排他,而自身内固,这些精英群体就是分割的;如果不同的精英群体在代际流动上互相转化,他们之间并不排他,自身也不内固,这些精英群体就不是分割的,或者说这些精英群体其实是一种人。

(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

萨列尼在一篇对市场转型理论争论带有总结意味的文章中提出了精英分化理论(Szelemyi & Kostello, 1996)。①之后在1998年,他在和伊亚尔、汤姆利合作的《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精英分化理论(Eyal, 1998)。精英分化理论是在萨列尼将市场渗透分为三种类型的制度背景下提出的。这三种类型的市场渗透是:(1)再分配经济中的市场;(2)在再分配经济占统治地位条件下,以市场与再分配共存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3)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其明确的目标是建立市场资本主义,抛弃国家社会主义。在萨列尼看来,1968—1980年的东欧和1977—1985年的中国存在的是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1980—1989年的东欧和

① 精英分化理论由萨列尼和科斯泰罗在1996年首先提出,在1998年,萨列尼与伊亚尔、汤姆利合作的《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参见Eyal et al., 1998)。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简单地说成“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

1986年以后的中国存在的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1989年后的东欧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而中国尚未出现。萨列尼的意图是以“市场渗透类型论”解释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在再分配经济下的地方市场类型中,市场提供了新的向上流动的渠道,传统再分配经济中的下层有可能成为成功者;而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私营经济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大批原来的干部精英进入了市场经济领域,并将官僚特权“商品化”,逐渐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改变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以保证他们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少受或不受损害。东欧国家所发生的激进的政治变革,改变了政治制度,导致了趋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使得原来的干部精英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具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干部精英已经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重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并且和新的政治精英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因而在新的政治制度下,他们的优势地位仍然保持下来;这些在过去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经过混合经济的转变,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地位基础的转变,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继续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另一部分不具有文化资本的行政干部精英被新出现的市场主体排挤了出去,或到了边缘位置而成为失败者。

精英分化的现象出现在第三种市场渗透类型:激进式变革发生后对于原有干部精英产生了不同影响。萨列尼等人认为: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阶段(1949—1960年代中期),政治资本居于主导地位,文化资本的作用虽然存在但不重要,经济资本甚至起到负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革阶段(1960中期—1989年代),政治资本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文化资本的地位上升,经济资本从负作用转为正作用;在后共产主义国家(1989年以后),文化资本居于主导地位,而原来的政治资本成了没有效用的资本,甚至还起负作用。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可以将原先的政治资本转化为社会关系网络,而这有利于抓住新的市场机会;相反,没有文化资本的人会发现原先的政治资本对他们来说甚至是不幸的(Eyal et al., 1998: 7—8, 20—45)。所以,干部精英中的部分成员(主要是技术干部精英)不仅拥有政治资本,而且拥有文化资本,他们积极参与并主导了这场变革,政治制度的剧烈变化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优势地位,只不过使得他们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发生了变化——他们将行政权力转化为对国有资产的实际占有,以使得他们的优势地位更为明显地被延续下来。另一部分成员(主要是行政干部精

英)由于只拥有政治资本,而欠缺文化资本,无法适应全社会范围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扩张,成为市场转型过程的最终失败者之一,与工人、农民陷入同样境地。

其实,萨列尼所说的精英分化现象不仅出现在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阶段中,而且发生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在萨列尼和科斯泰罗1996年的文章中就有所涉及(Szelenyi & Kostello, 1996)。^① 如果从资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精英分化理论,精英分化理论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代内政治资本很难转化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则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针对于此,笔者试图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国家自上而下渐进改良式变革的制度背景下,是否也会出现精英分化现象?

(三)精英分割和精英分化理论的缺陷

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是不同的,笔者之所以将它们搁在一块讨论,是因为它们虽从不同的角度却共同讨论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问题,而这两个理论又恰好构成了精英研究的一个序列。前者从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职业路径的角度,认为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进入路径是分裂的;而且因为干部精英掌握了再分配权力,所以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是分割的;这种分割状态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虽然发生了些微变化,但是分割的界限仍然是泾渭分明的。后者则是从市场渗透对社会分层模式的影响这个角度,发现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激进转型过程中,原来的干部精英内部发生了分化:技术干部精英摇身一变成了私营企业主或法人资产阶级,继续把持社会上层位置,而行政干部精英由于其赖以生存的再分配的权力基础已经丧失而成了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失败者。

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且清晰地勾画出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的精英状态。在转型中的中国,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第一,专

^① 萨列尼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政治资本仍然是获得权力与特权的最主要来源,文化资本次之,经济资本更次之(Eyal et al., 1998: 23)。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旧官僚本不应该成为输家。由此可以看出萨列尼的说法有些不够清晰的地方。

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逐渐形成了紧密的“联盟”(参见孙立平等, 1998); 第二, 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之间通过各种渠道相互渗透; 第三, 干部精英中的行政精英并没有成为改革的失败者。这是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出现的趋势是: 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已经组成强大的联盟, 精英与大众的分化越趋明显和固化, 中国的社会力量的重组并不是向中产阶级社会迈进, 而是不断走向两极社会(孙立平等, 1998)。然而这些学者的讨论主要是在代内分析了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关系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 对精英联盟和排斥非精英的具体机制并没有阐释。

二、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一) 理论模型

上述现象和研究促使笔者反思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在中国的真正解释力。笔者尝试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两个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社会的这些独特现象, 即“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既有的精英分割和精英分化理论都是在代内流动的框架下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 而我们提出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框架则是从代际流动的角度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之所以要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讨论精英的分割与分化问题是因为: 代际流动比代内流动更能反映社会分层模式的长期趋势和内在本质, 尤其当我们尝试解释一种阶层的形成时。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指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 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 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不是排他的, 内部也不是内固的, 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 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如果从资本转化的角度来看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则会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不发达的、渐进式转型的社会中, 精英群体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代际间能自由地转化。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 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

精英排他: 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的非精英群体的子代很难进入精英群体,或者说非精英群体的子代与精英群体的子代成为精英的几率存在显著差别,前者的几率明显小于后者。这是假设一,简称为“精英排他”假设。

精英代际转化: 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子代能够自由转化成任何一种精英,也就是说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或者说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子代进入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几率没有显著差别。这是假设二,简称为“精英代际转化”假设。

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共同促成了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的形成,并且实现了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样一种再生产与每个精英群体的再生产或者本文所说的“精英排他”不同,因为不同精英群体的各自再生产和自身内固完全有可能造成这些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的分离,而这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精英群体,也就无法实现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精英群体都排斥非精英,并在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转化,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才得以形成,并且实现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精英排他假设是指中国的精英集团的后代获得精英位置的机会明显高于非精英的后代;精英代际转化假设则是指不同的精英集团的后代成为任何一种精英的机会都没有显著差别,精英与非精英的界限严格,而精英之间则不存在明显的界限。笔者通过证明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两个假设推导出:在转型中的中国,不同精英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种推导是有理论依据的,其理论前提正如吉登斯所主张的“中介结构化”(the mediate structura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Giddens, 1973: 107),即流动是促成阶级形成的基本因素;而且在某一特定社会中,阶级的团结一致程度和阶级界线的严格程度都取决于流动机会分布。

如果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能够成立,它将说明:(1)精英分割理论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揭示,精英分割是因为各种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的排他和各自内部的内固,即各种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各自再生产;如果实现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干部精英与专业技术精英之间就不是分割的。(2)精英分化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惟一走向。这是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

混合经济和渐进改良的制度背景下,各种精英不仅能够很大程度上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而且通过代际流动实现了不同精英位置的转化。

(二)机制剖析

上文只是提出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出现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呢?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还是向市场过渡的一种表征呢?笔者尝试分别分析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以求揭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成因。

“精英排他”的机制是:党员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它可能是成为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从来就不是一个先决条件(Walder, 1995; Walder et al., 2000)。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无论是成为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高教育程度都日益演化成获得精英位置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然而,高教育程度同时也日益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精英群体的后代获得高教育的几率明显大于非精英群体的后代。这样,精英与非精英的隔离则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也就是说,精英群体通过控制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传承精英地位。

“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属于利益获得者。关于利益的操作化测量是相当困难的事情。魏昂德在1995年的文章中将利益分为职权、收入和住房三方面来分析,他要证明的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利益有显著差别,只有干部精英是“再分配精英”。但是,将收入作为利益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问题。由于收入分配在中国还远未实现制度化和市场化,这将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大量体制内的回答者很可能有其他隐性收入,他很可能瞒报收入,或很难正确地累计收入。第二,即使同一类精英,其内部的收入很可能差别很大。譬如,专业技术精英内部收入就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刚进IT行业、只有本科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月薪可达到1万以上(更何况当他成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之后),而50多岁、已工作很多年的大学教授的年薪却很难达到5万。由此,我们很难将收入作为观察不同精英之间利益差别的指标。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解析“利益”,譬如工作紧张程度、从事第二职业的可能性等等。因为专业技术精英很可能在职权上与其他精英相距较大,但却可能拥有很

宽松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更长的假期,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从事其他工作,这些都应该列入“利益”的考虑范畴。鉴此,笔者将保留采用住房使用面积作为衡量利益的指标,因为:(1)住房使用面积可以呈现隐性收入的含金量及难以测量的问题,住房使用面积相似的回答者的总收入应该差别不会太大;(2)住房使用面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回答者的生活方式是否比较宽松,有相似住房面积的人,其生活空间和生活自由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似的。

针对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笔者提出:

假设三:党员在任何时期都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群体的先决条件。它可能是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从来就不是一个先决条件。

假设四:高教育程度自改革后日益演化成获得精英位置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无论是对干部精英还是对专业技术精英。

假设五:党员身份的获得与家庭背景无关。精英与非精英的后代成为党员的几率没有明显差别。

假设六:高教育程度日益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精英群体的后代获得高教育的几率明显大于非精英群体的后代。

假设七:精英之间的住房使用面积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三到假设六涉及“精英排他”的机制分析,假设七则是有关“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假设三和假设四是魏昂德提出的,笔者则将精英群体分成三种精英以再检验一下他所提出的这两个假设。

(三)数据与变量

1. 数据

本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挪威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Fafo)资助、Fafo和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共同主持的研究项目:“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就业与流动”。该项目于1998年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市,通过PPS方法,共抽取了7500名受访者做入户问卷调查。其中,具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居民为4264名,最终完成的这部分有效问卷为3975份。本文的数据及统计分析即据这部分有效问卷提供的调查结果。^①

^① 有关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可参看王奋宇、李路路,2001。

抽样所及的三个城市分别属于北方(北京)、长江三角洲(无锡)和珠江三角洲(珠海)。这三个城市在地理分布、城市规模、城市历史与经济社会特征、经济体制改革诸方面分别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城市社会类型。

2. 变量

精英分割是讨论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关系,精英分化是讨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之间的关系,本文讨论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主要是通过代际流动讨论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三者之间的关系。父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找到第一份工作时父亲的职业来划分的,子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在调查时点的职业(现职)来划分的。

(1) 干部精英

干部精英指的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精英的特征是在组织中具有一定的职务,因而他们不仅具有控制和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而且还具有直接控制和支配他人的权力。

(2) 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

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是干部精英的两个部分:前者只拥有政治资本,欠缺文化资本;后者不仅拥有政治资本,而且拥有文化资本。在具体操作上,本文将大专教育程度以下的干部精英列为“行政干部精英”,大专及以上学历程度的干部精英列为“技术干部精英”。本研究并没有单列经济精英,这首先是因为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经济精英(不论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还是私营企业主)具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他们大多是干部精英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变形;其次是因为数据中私营企业主很少。基于这两个考虑,笔者将经济精英列入干部精英中分析。

(3) 专业技术精英

专业技术精英指的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需要说明的是,在涉及专业技术人员的操作化分类中,我们根据受访者的具体职业、工作组织和在工作组织中的位置,对受访者自认的“专业技术人员”分类进行了重新整理。很多在党政机关、企业中工作的受访者自我确认为“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标准主要是学历;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担任着各种各样的职务,有的甚至是单位负责人。他们的地位特征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所拥有的科层制权力标识于世,而其权力实际上主要并不是来自于专业技术知识,我们因此不将其归入“专业技术人员”分类。在我

们看来, 专业技术人员主要是指那些居于以运用专业技术知识为主的工作位置者, 他们的地位资源主要在于专业技术知识的拥有, 而非科层制权力的占有。对于那些在科研、教学等部门中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则没有进行类似前者身份的重新整理。

(4) 非精英

非精英指的是干部精英(包括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以外的社会成员。

(5)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指的是上学或培训的总年限。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

(6) 党员身份

党员身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不包括其他党派的党员。在分析中是定类变量。非党员是参照项。

(7) 参加工作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指的是参加第一份工作的时间。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

(8) 城市类型

城市类型指的是北京、无锡、珠海三市。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珠海是参照项。

(9) 性别

性别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女”是参照项。

(10) 年龄

年龄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 作为控制变量使用。

(四) 方法与模型

1. 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 验证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假设(或者说精英排他假设和精英代际转化假设); 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验证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 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验证党员身份获得模型; 一元线性回归方法验证教育程度获得模型和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2. 模型

模型 1: 精英排他模型;

模型 1. 1: 行政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 1. 2: 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 1. 3: 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 2: 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 2. 1: 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 2. 2: 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 2. 3: 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 3: 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模型 4: 教育程度获得模型。

模型 5: 党员身份获得模型。

模型 6: 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是对假设一和假设二的检验。模型 1、模型 4、模型 5 是对假设三到假设六的检验。模型 6 是对假设七的检验。

(五)分析与解释

1. 精英排他模型

表 1 模型 1: 精英排他模型

自变量	发生比率		
	模型 1. 1 行政干部精英/ 非精英	模型 1. 2 技术干部精英/ 非精英	模型 1. 3 专业技术精英/ 非精英
父亲是行政干部精英	1.355	2.271*	1.340
父亲是技术干部精英	1.488	2.906*	2.295*
父亲是专业技术精英	.761	3.795*	3.034*
教育程度	1.079*	1.847*	1.891*
党籍(党员)	2.578*	2.881*	.804
年龄	1.025	1.020	1.055*
性别(男)	1.534*	1.258	.640*
参加工作时间	.989	.982	1.039
城市(北京)	.495*	.553*	.710
城市(珠海)	.393*	.616	.741

注: 在所有的方程中, N= 3616.

父代和子代职业的参照项是“非精英”。

* $p < 0.05$ (双尾检验)。

在表 1 的三个模型中, 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 发现:

(1) 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 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 也就是说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 这与笔者的假设相矛盾。

(2) 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 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 发生比分别高出 1. 271, 1. 906, 2. 795, 这说明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

(3) 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 成为专业技术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 发生比分别高出 1. 295, 2. 034, 这说明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

由此看出, 精英排他假设得到了部分证实: 行政干部精英不排斥非精英, 而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都排斥非精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笔者将在下文的“精英排他的机制”部分给出解释。

2. 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在表 2 的三个模型中, 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 发现:

(1) 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相比, 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 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技术干部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 或者说, 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2) 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 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 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 或者说, 行政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3) 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 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 这说明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 或者说, 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

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表 2 模型 2: 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自变量	发生比率		
	模型 2.1 行政干部精英/ 技术干部精英	模型 2.2 行政干部精英/ 专业技术精英	模型 2.3 技术干部精英/ 专业技术精英
父亲是行政干部精英	1.165	4.033	1.355
父亲是技术干部精英	—	2.585	1.012
父亲是专业技术精英	.391	—	—
教育程度	.584 *	.571 *	.976
党籍(党员)	.895	3.204 *	3.582 *
年龄	1.005	.972	.967
性别(男)	1.219	2.395 *	1.965 *
参加工作时间	1.007	.952	.945
城市(北京)	.895	.697	.779
城市(珠海)	.639	.531 *	.831

注: 在所有的方程中, N= 3616.

“非精英”加入分析,但由于它对验证精英代际转化假设不起作用,所以在表格中没有列出。

在模型 2.1 中,父代和子代职业的参照项是“技术干部精英”。

在模型 2.2 和模型 2.3 中,父代和子代职业的参照项是“专业技术精英”。

* $p < 0.05$ (双尾检验)。

由此,精英代际转化假设得到了完满的证实。结合表 1 和表 2 的六个模型,可以说明:

(1)在中国,精英之间的区隔并不明显,不同类型的精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精英阶层,他们虽然是有差别的,但其实是一种人。他们在代际间不断地周而复始地进行转化或人员交换,他们之间的差别远远没有达到魏昂德所认为的冲突、矛盾以至于造成中国政治秩序不稳定的程度。

(2)虽然有些精英的子代变成了非精英,也有些非精英的子代变成了精英,但观察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深层真相决不能只看绝对数量上的变化,因为这种数量上的变化有可能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动的结果。

譬如说,非精英的子代进入精英阶层有可能是精英阶层扩大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分层的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而发生比率则是剥离了社会结构变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变动的情况,更直接地反映出社会分层秩序的真相。发生比率说明,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非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除了行政干部精英)都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其他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别。从“优势”这个意义上而言,几种精英并没有发生分化。

(3)这个精英阶层并不像笔者所想象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而行政干部精英却没有;非精英的后代可以通过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进入中国的精英阶层。但是,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参见下文分析)。

3. 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上文证明除了行政干部精英,其他两种精英都具有较强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那么整个精英阶层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或者说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强呢?表3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精英阶层的子女成为精英的发生比是非精英的子女的1.925倍。这说明整个精英阶层的确是再生产的。当然,这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能力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相比并不算强。彭玉生利用英国的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在英国,大雇主的儿子成为大雇主的比率是工人儿子的95倍(彭玉生,2000)。

表3 模型3: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自变量	发生比率(子代是精英/非精英)
父亲是精英	1.925 *
教育程度	1.450 *
党籍(党员)	1.774 *
年龄	1.052 *
性别(男)	1.050
参加工作时间	1.015
城市(北京)	.589 *
城市(珠海)	.519 *

注:在所有的方程中, N= 3650。

父代和子代职业的参照项是“非精英”。

* $p < 0.05$ (双尾检验)。

4. 精英排他的机制

精英排他假设只得到了部分证实。为什么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不同的精英排他能力呢？在这一部分，笔者主要尝试给精英排他提供一个机制上的解释。这个机制应该从精英获致途径上探索。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中国无论成为哪种精英，教育程度的作用都是显著的（假设四得到证实），而党员资格只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起正面作用，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没有作用（假设三得到证实）。教育程度的获得受到了家庭背景的显著影响。

表 4 说明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在获得教育机会、资源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假设六得到证实）。因此，“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至于“行政干部精英”不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倾向的原因将在下文解释）。此外，表 1 的分析显示，在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获得途径上，父代的精英背景是个非常强的影响因素，它具有独立于教育和政治身份传承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独立于并且明显超过其他因素的影响力（譬如党员身份或教育程度）。那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父代的精英背景是通过何种机制来作用于子代精英位置的获得的？它是通过关系网络还是政治市

表 4 模型 4: 教育程度获得模型

自变量	受教育年限
父亲是行政干部精英	.063*
父亲是技术干部精英	.111*
父亲是专业技术精英	.086*
党籍(党员)	.221*
年龄	.008
性别(男)	.090*
参加工作时间	.521*
城市(北京)	.197*
城市(珠海)	.060*

注：在方程中，N= 3832。

父代职业的参照项是“非精英”。表格中数据为标准化系数。

* $p < 0.05$ (双尾检验)。

场和文化市场的交易(如买官鬻爵等)来作用于子代的精英位置呢?这需要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

为什么“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而“行政干部精英”却不具有这种倾向呢?这是因为,虽然教育程度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具有优势,但优势不大,提高一年教育程度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的发生比只提高了 0.079 倍(1.079-1, 参见表 1);相反,党员身份的作用却很显著,具有党员资格的人成为“行政干部精英”的发生比是不具有党员资格的人的 2.578 倍(见表 1)。此外,父代的精英背景对子代成为行政干部精英也没有直接的明显优势(见表 1)。因此,在行政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党员身份是比教育程度和父代精英背景强烈得多的变量,也是最重要的变量。而党员身份的获得与父代是否是精英没有关系(见表 5)(假设五得到证实)。因此,“行政干部精英”不排斥“非精英”。

表 5 模型 5: 党员身份获得模型

自变量	党员
父亲是行政干部精英	.866
父亲是技术干部精英	.942
父亲是专业技术精英	1.231
教育程度	.839*
年龄	.996
性别(男)	.565*
参加工作时间	1.050*
城市(北京)	.923
城市(珠海)	1.737*

注:在方程中, N=3662。

父代职业的参照项是“非精英”。表格中数据为发生比率。

* $p < 0.05$ (双尾检验)。

为了更明晰不同精英类型的获致路径,笔者用表 6 示之。如表 6 显示,在行政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政治资本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文化资本,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则没有影响。在技术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代际直接传递机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政治资本,再次是文化资本。在专业技术精英的获致路径上,代际直接传递机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不起作用。横向比较文化

资本对获致不同精英的作用, 强弱程度依次是专业技术精英、技术干部精英、行政干部精英。横向比较政治资本对获致不同精英的作用, 强弱程度依次是技术干部精英、行政干部精英, 对专业技术精英不起作用。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精英排他的机制是精英地位的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和高教育程度的传承。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后代的进入, 由此党员身份成为削弱精英排他的一个重要变量。

表 6 不同精英类型的路径决定因素

资本类型	行政干部精英	技术干部精英	专业技术精英
代际直接传递机制	—	++++	++++
文化资本	+	++	+++
政治资本	++	+++	—

5. 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

表 7 显示, 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住房使用面积上没有显著差异。正如笔者在上文已经阐述的, 住房使用面积可以作为利益比较的一个比较好的测量指标, 因此我们可以说, 这三种精英之间的利益没有显著差别。当然, 我们还可以尝试从其他角度来解析利益状态, 来分析这三种精英之间的利益差异。用利益来解释精英代际转化其实暗含着理性人的假设: 正因为人都是理性的, 而每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 所以成为何种精英都能受益, 所以精英代际转化得以可能。

表 7 模型 6: 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自变量	住房的使用面积
子代是行政干部精英	.012
子代是技术干部精英	.060
参加工作时间	-.052
性别(男)	-.023
年龄	.096
北京	-.518*
无锡	-.219*

注: 在方程中, N=653。子代职业的参照项是“专业技术精英”。

表格中数据为标准化系数。

* $p < 0.05$ (双尾检验)。

三、结 论

本研究认为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都无法完全捕捉当代中国的精英流动状态；相反，社会分层的主流模式是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也就是说，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不是排他的，内部也不是内固的，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假设：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精英排他的机制揭示的是精英地位的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和高教育程度的传承。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后代的进入，而党员身份又是削弱精英排他的一个重要变量。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揭示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再生产。

从制度背景来看，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既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也不是向市场资本主义过渡的表征，而是中国自身特有的转型类型所导致的。换句话说，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是市场转型和转型所处的制度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向市场转型对“精英排他及其机制”起主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文化资本对所有的精英位置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相对稀缺，所以，所有的精英群体用尽办法控制教育资源。他们通过代际传承在教育获得上占有优势，并由此传承精英地位。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逻辑控制着“精英排他及其机制”。

其次，“精英代际转化及其机制”又是由转型所处的制度背景产生的。这个背景就是中国是个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改革从始至终都是由国家控制的，用渐进的方式展开的。在这种背景下，专业技术精英不是独立的，必须从政治（行政）系统获得经费和身份认同从而获得相应的地位。利用改革由国家控制这个契机，干部们可以转化身份而

获取既得利益。此外,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也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必要基础。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相对不发达的工业化、科技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文化资本的作用虽然日益凸现,但专业化的程度并不高。所以,那些文化资本较低的行政干部精英可以被国家安排到占有利益但无须太多专业知识的闲职上,譬如工会主席、公司的名誉顾问、名誉董事等。亦因之,行政干部精英不会成为改革的受害者,他们与技术干部精英之间也不会分化。相反,在东欧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都相当成熟,文化资本对于每个高层职位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在那里,行政干部缺少文化资本无法承受新工作环境的强烈挑战,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市场转型的失败者。

上述的讨论说明,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化相对不发达、始终由国家主导这个制度背景下发生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成了必然现象。随着向市场转型的深入,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将会更加明显、更加直接、更加稳定。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比再分配经济更加稳定的制度环境,更少受到变动的政策的影响。因此,只要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个制度背景不变,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会越加稳固与强化。

参考文献:

- 德热拉斯(M. Djilas), 1963/1957《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 彭玉生, 2000,《现代英国阶级与职业的代际流动》,《国外社会学》第5期。
- 孙立平、李强、沈原, 1998《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第5期。
- 王奋宇、李路路, 2001,《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 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北京:北京出版社。
- Eyal, Gil, Ivan Szelenyi & Eleanor Townsley 1998,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London, New York: Verso.
- Giddens, Anthony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 Konrad George & Ivan Szele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Szelenyi, Ivan, 1982,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 1983 *Urban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socialism*.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The Prospect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lass Project: An Auto-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Politics and Society* 15.
- 1988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zelenyi, Ivan & Eric Kostelb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Walder, Andrew G. 1994,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23.
-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 2003 "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 Walder, Andrew G., Bohai Li & Donald J. Treiman 2000,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 Zhou Xueguang Nancy Brandon Tuma & Phyllis Moen 1996 "St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socialism: The Case of Urban China, 1949-1993." *Social Forces* 74.

作者单位: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郑辉)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
责任编辑: 张宛丽

Abstract: How do the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e affect people's life chances? Taking the needs of the state and its agencies — to extract enough revenue and to maintain political support —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continued political authoritarianism increases the motivation and ability of the state to relieve the burden on peasants. At the central level, the political need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ve gradually prevailed over its economic needs and the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relieve rural societies. However, changes in the polici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o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will follow suit. Based on ethnographic data from three townships in rural Guangdong, this study illustrates how the township governments respond to the state's needs according to their situation and accordingly increase or decrease peasants' life chances.

Elite Exchange and In-group Reproduction in Urban China
..... *Zheng Hui & Li Lulu* 65

Abstract: Two theories have been dominant in the studies of elite under state-socialism. Walder's theory of "divided elite" depicts two distinct elite groups as cadre elite and professional elite. Szelenyi's theory of "differentiated elite" takes on the issue of differentiation of former elite in transitional post-socialist societies. As neither of the theories could fully capture or explain the dynamic of elite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uthors propose a theoretical model of "elite exchange and in-group reproduction". Elite exchange and in-group reproduction contains two mechanisms: elite exclusion and elite exchange. The conjunctive function of elite exclusion and elite exchange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elite class in China.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preliminary evid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frame.

Generalized Social Capital versus Particularized So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Chen Jie & Lu Chunlong* 87

Abstract: Scholars are still debating on the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ir roles in shap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two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 generalized and particularized — on the performance of grassroots self-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n urban China, based on an original survey of 144 urban neighborhood communities in China's three major citi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generalized social capital embodied in the indiscriminative trust and inclusive social networks positively affect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lf-government institutions, while the particularized social capital as manifested in discriminative trust and exclusive social networks has negative impacts.

"Field of Qi" and the Occurring Mechanism of Mass Disturbances: A